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ZHU XI'S WORLD OF THOUGHT

朱熹的思维世界 (增订版)

[美] 田浩 著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ZHU XI'S WORLD OF THOUGHT

朱熹的思维世界 (增订版)

[美] 田浩 著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熹的思维世界(增订版)/[美]田浩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5754-9

I. 朱... II. ①田... ② III. 朱熹(1130—1200)—哲学思想—研究 IV. B24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7857 号

Zhu Xi's World of Thought

本书经著作权所有人 Hoyt Tillman 授权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简体字本(增订版)。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9-157

书 名 朱熹的思维世界(增订版)

著 者 [美]田 浩

责任编辑 张晓薇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mm×1304mm 1/32

印 张 12.875 插页 4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754-9

定 价 3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作者的话

尽管在增订版中增加了新的内容(主要基于作者两篇学术期刊论文),本书的主旨仍然围绕两个主题展开:

第一,当将朱熹放置于同时代的儒家思想家的大框架中,我们对于朱熹及其思想是否能有新的理解?几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程朱理学有着过度的关注。如果将这种过于集中的视角转移一下,我们是否能更进一步地欣赏那些与朱熹同时代的思想家?这不仅是对他们自身思想的欣赏,更是对他们在朱熹就各种问题及政策提出的思想主张的发展中所起作用的欣赏。

第二,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具有共同关注的一群儒家学者所组成的道学“团体”,是如何发展演变成自成一家的思想学派,乃至南宋末期正式成为政治思想上的正统学说的。尽管大多数近代学者将程朱理学的胜利归功于朱熹的门徒学生,那么其他儒家学者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更重要的是,在朱熹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他自己的言行是怎样影响着道学团体的狭化的。比如说,朱熹对于经典的评价是否将自己推向一个解读经典的权威和道学传统的界定者的位置?

对于90年代出版的我的英文原版和扩充的中文版,几位学界同

仁质疑我是否过分强调了朱熹成为道学领袖的企图。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学界领袖倡导自己的学术主张,排斥异家学说,是很正常的,因此,朱熹在这一点上,与其他领袖并无显著不同。为阐述这一问题,我专门新增了“朱熹的祈祷文与道统观”一章,以证明朱熹超乎常理的言行与主张。比如说,在他献给孔子的祈祷文中,朱熹将自身作为其门徒和孔子灵魂的中介。在祠堂举行的祭祀先贤的仪式中,他让其门徒宣称在从古圣先贤到朱熹本人的道统传承过程中没有任何缺失;而且还让门徒们宣誓一定要原封不动地将自己的理论再传承下去。此章填补了1996年版《朱熹的思维世界》以及朱子学研究的一处空隙。

原版书中的另一个弱点就是结论过于集中于四个关键问题的讨论。这样一来,一些读者也许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忽略了书中原本设定的大框架中的其他重点议题。增订版在结论一章中新增了两个小节。第一个小节对于原书所设定的大框架中的重点议题进行了总结。新增的第三小节则用一个具体的范例阐释了通过对宋代儒家思想进行更为广阔的考查,我们能增强对当代有关儒家思想道德如何影响了东亚20世纪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解。我希望这一增补的总结,可以将我论文中关于我们对宋代儒家和一些当代问题的理解阐释清楚。

也许是在回应我在80和90年代的一系列著述,许多学者更多地采用“道学”作为一重要学术类别来讨论宋代儒家流派的发展演变。同时,他们普遍意识到“道学”在宋代发展成一个由朱熹及其主要门徒主导的排斥异说、唯我独尊思想学派的缓慢演变过程。在我获得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 Prize(德国洪堡基金奖)的期间和之后,我有幸和Hans van Ess(叶翰)教授和他以前在慕尼黑大学的一些学生,以及很多其他德国学者,探讨了这一发展过程。实际

上,叶翰教授^①, Christian Soffel^②(苏费翔)博士, Kai Marchal^③(马恺之)博士的研究著述在深度和广度上增强了我对“道学”及其局限性的理解。2003年至2004年,我获得了 William Fulbright Foundation(富布莱特基金会)以及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的科研资助,前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进行了16个月的研究。期间,我有幸和中心的同仁们,还有很多在别的单位的朋友们,包括陈来、姜广辉、梁涛、朱杰人、朱汉民等先生探讨了道学的有关问题。与台湾学者黄进兴、张寿安和夏长朴各位先生的讨论也使我受益匪浅。我很高兴地发现中国学者开始引用我对于道学发展历史的著述和观点;中国学者徐洪兴是其中一例。^④日本东京大学的小岛毅先生及其宋代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也特别值得一提。^⑤尽管我们做的领域与方向不同, Benjamin Elman(爱尔曼)教授和我对于“Neo-Confucianism”(新儒学)这个学术术语的看法却很相近,都认为这个术语的使用歪曲了儒家思想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发展进程。还有很多学术同仁和朋友的研究和讨论,丰富了我对宋代历史和儒家思想的理解和认识,但在此我想特别感谢那些和我同样致力于道学研究的学者们。

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当代的许多学者继续将广义

① Hans van Ess, *Van Ch'eng I zu Chu Hsi: die Lehre vom rechten Weg in der Überlieferung der Familie Hu*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3); 与其“The Compilation of the Works of the Ch'eng Brothers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Learning of the Right Way of the Southern Sung Period.” *T'oung Pao* 90.4—5 (2004): 264—298.

② Christian Soffel, *Ein Universalgelehrter verarbeitet das Ende seiner Dynastie - Eine Analyse des Kunxue jiwén von Wang Yingli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③ Kai Marchal, *Die Ordnung des Politischen und die Ordnung des Herzens - Eine Studie zum politisch-philosophischen Denken des Lü Zuqian (1137—1181)* in: *Digitale Hochschulschriften*,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University of Munich), July 2006.

④ 徐洪兴:《道学思潮》收入尹继佐、周山编:《中国学术思潮史》第五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⑤ 小岛毅:《宋学之形成と展开》(东京:创文社,1999年)。

的“新儒学”作为在某种程度上意义等同于、但范围要广于传统“理学”的术语。但就像余英时老师在其《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指出的那样,“道学”是宋代常用的术语,指的是一批人试图用政治影响来改良社会和政府;而“理学”则是宋代一个不太常用的范畴,而且它则更侧重于抽象和形而上的哲学概念。^①然而,经过最近几个世纪的演变,“理学”逐步成为更常用的术语,并不但被用来指称狭义的程朱学派,而且被用来指称唐代(尤其是韩愈)以来所有的儒家思想学说,因此“理学”的范围很不清楚。一些学者(特别在美国)现在将“理学”、“道学”和“新儒学”作为同义词替换使用。我对这种宽泛的使用表示遗憾,因为它不仅混淆了不同的学派的区别,而且忽视了儒家思想在宋代及宋之后的发展变化过程。Hilde de Weerdt(魏希德)博士最近将“道学”看成是朱熹在12世纪晚期将二程学说重新打造成的一个思想学派。而且她认为我所指的“道学”是所谓的“ecumenical”(各学派的大一统)。^②她好像将我所提的“道学”观点过于简化了。另外,她看起来似乎太过囿于《宋史·道学传》中过分狭隘的“道学”理念。值得一提的是,魏希德教授引用了我于1992年发表在《东方与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的文章和1992年出版的英文著作,而没有引用我后来发表的文章和我的《朱熹的思维世界》。我希望这次带有更多补充章节和扩充结论的中文增订版可以将我的论据和观点表述清楚。

并入增订版中的两篇文章最初来源于两个国际著名的学术杂志。“朱熹的祈祷文与道统观”一章修改自我在2004年发表于《东方

①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年;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② Hilde de Weerdt, “The Composition of Examination Standards: Daoxue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y Examination Culture,” Ph.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与其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9* (Cambridge, M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 Se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与西方哲学》杂志上的文章。^①结论中新增补的两个章节修改自我在2002年发表于《中国学术》的文章。^②对于两位杂志的主编,Roger Ames(安乐哲)先生和刘东先生同意我对这两篇文章进行修改并使用,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而且我也十分感激他们多年以来对我研究和出版工作的鼓励和帮助。还需提及的是,北大哲学系博士生高海坡翻译了我在《东方与西方哲学》杂志上的文章手稿。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博士生姜长苏则翻译了我在《中国学术》杂志上的手稿。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的刘倩同仁和台湾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张志惠与童永昌帮我进行了增订版二校的审定。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博士生阎琨帮助我翻译了这篇谢辞。

由于翻译撰写本书的原来中文稿,我那时候有机会扩充及修订英文原著对南宋道学的认识;那次重新阅读南宋思想的史料,使我能够提供一项比英文旧著更详尽、更精谨的论述,并且进一步发挥、澄清原来的论证。那时在亚利桑纳州立大学读书的牛朴、冀小斌先生为我翻译最初的草稿;黄进兴、池胜昌、黄明理、俞宗宪、程一凡及刘景修先生提供许多修改草稿的宝贵意见。池胜昌先生从新泽西(New Jersey)来到亚利桑纳,前后辛勤工作40余日,对草稿做最后的重新修订,不但润饰中文的写作风格,并使译文能够更忠实于我的本意。

我很感谢台湾大学教授夏长朴先生,特别为增订版写序。他在儒家哲学上的造诣和有关北宋的专著为本书对于南宋的探讨奠定了基石。我的原书已经绝版几年了,在此对于黄进兴先生推荐此书的再版和杨家兴先生细心的编辑修订工作表示感谢。2002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也已经绝版,在此对于刘东先生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增订本也表示感谢。

① Hoyt Cleveland Tillman, "Zhu Xi's Prayers to the Spirit of Confucius and Claim to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Wa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4.4 (October 2004): 489—513.

② 田浩:“从宋代思想论到近代经济发展”《中国学术》2002年,第10辑,页167—192。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余英时先生。他为原版中文书特别写序,并于此次再与新序。他的为人师表、学术建树始终是我努力的源泉。我谨将此增订版献给余英时老师,祝贺他获得克鲁格(Kluge)大奖。

我也必须感谢妻子宓联卿女士,以及子女田亮、田梅,他们在我觉得写作此书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时,仍然使我感到生活充满乐趣,并且使我的思想能够保持平衡,不致一去不返,迷失在遥远的南宋时代。

田 浩

2008年1月20日写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献 给

我的老师余英时先生

增订版序一

田浩在《朱熹的思维世界》出版以后,依然不断精进,继续研究朱熹和南宋以后的儒学发展。这次印行增订版,收入了近年来的新收获,其中最重要的是“朱熹的祈祷文与道统观”和“结语以及感想”两章。在“祈祷文”一章中,他通过朱熹对于孔子的祈祷文以及其他相关的资料,深入研究了朱熹的鬼神观和道统观之间的关系。这确是前人所没有涉及的领域;他不但提出了新的问题,而且扩大了朱学的范围。在“结语”一章中,他则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域观察朱学在南宋的位置和后世的流变。与本书初版的结语部分相对照,这一章的深度和广度也都大幅度地提升了。

我读了这两章,对作者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十分钦佩。孔子说:“吾见其进,未见其止。”这两句话在阅读过程中时时往复胸中。朱熹的“思维世界”本来便是十分广阔而复杂的,经得起古今无数学人的长期探索。因此治朱学的人特别需要兼备“高明”和“沉潜”两种本领。“高明”,才能见其大而不断开拓这一“思维世界”;“沉潜”,才能继续发掘它的丰富内涵而展示其精微性与复杂性。田浩恰好便是一位能在“高明”与“沉潜”之间保持均衡的学人,这部增订新版便是最有力的见证。

上面已指出,作者论鬼神观与道统观之间的内在关联,为朱熹研究开辟了新园地。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有其他学人在这一片新园地中继续开拓,因为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是很复杂的。作为“祈祷文”汉译本的最早读者之一,我愿意作一个小小的补充并表示一点同声的欣悦。

作者说,朱熹对孔子的祈祷“帮助他增强了他已经完美无缺地获得了孔子所传之‘道’的信心”。作者在这里特别强调朱熹的“自信”的一面,当然是有根据的。朱熹的确深信他所遵循的是孔子求“道”的唯一正途。我想补充的是,朱熹在求“道”的过程中也有“自疑”的一面,同样值得重视。顾宪成(1550—1612年)在“刻学菴通辨序”中说:“朱子岂必尽非,而常自见其非。”(《泾皋藏稿》卷六)这句话则将朱熹的“自疑”精神生动地呈现了出来。朱熹晚年在竹林精舍上写过一副“桃符”(即春联):“道迷前圣统,朋误远方来。”(《语类》一〇七“杂记言行”节)这显然表示:他对自己是不是已全面掌握了“道统”的内涵,仍存疑问,唯恐误导了远来问学的弟子。他的门人对这副联语大概也印象很深,因此记录了下来。我认为这又是朱熹“自疑”的一种表现,不是故作谦词。朱熹求“道”,自始至终都在“自信”和“自疑”的紧张心理状态下进行,这是他治学的一个主要特征。他临终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更是明证。

作者在“祈祷文”一章的结尾处,特别强调朱熹的“使命感”,并清楚地指出:“在朱熹的思想中,社会政治关怀——理论上的实践——是首要的。”这正是我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允晨,2003年)一书中所展开的基本论旨之一。中国史在宋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治、社会、宗教、经济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动。“士”阶层乘势跃起,取得了新的政治社会地位。这一阶层中的少数精英(elites)更以政治社会的主体自居,而发展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普遍意识。这便是作者所说的“使命感”。他们的“使命感”主要体现在儒家的整体规划上面,即借“回向三代”之名,全面地重建新秩序。根据“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古训,他们首先以朝廷为中心,发动全面的政治革新,所以庆历、熙宁变法相继出

现。但地方性或局部性的社会、道德秩序的推行也同时展开,故有义庄、族规、乡约、书院的创建。张载“有意于三代之治”,但从朝廷回到关中之后,立即在本乡以“礼”化“俗”,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为“在下位则美俗”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事例。无论在朝在野,士的“使命感”在南宋依然十分旺盛,朱熹更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他在政治上向往王安石“得君行道”的机遇,所以期待晚年的孝宗可以成为他的神宗,重新掀起一场“大更改”运动。绍熙五年(1194)他立朝四十日便是为了领导朝廷上的理学集团推行改革(即所谓“孝宗末年之政”)。但在奉祠禄或外任时他则转而致力于地方上局部秩序的重建,如设立社仓、书院,以及重订吕氏乡约之类。不仅朱熹如此,同时的陆九渊、张栻、吕祖谦等也无不如此。现在本书作者通过“祈祷文”的专题研究,也进一步发现“政治、社会关怀”在朱熹思想中居于“首要的”位置,和我的整体观察恰好可以互相印证,我当然有闻空谷足音的喜悦。

在增订版的“结语”一章中,我很高兴看到作者扩大他的视域,涉及朱熹思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更感谢他肯用相当大的篇幅讨论我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简称《商人精神》),并澄清了一些评论者的误解。他参考了我在1997年发表的两篇英文论著,因此他的了解更为深入。不过在《商人精神》之后,我又继续研究了明清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与儒学新取向之间的互动。其中较重要的是“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收在《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1—127)和“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见《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允晨,2004年,页249—332)这三篇专题研究,事实上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和《商人精神》两部书之间进行了一些贯通的工作。举其最要者而言,历史变动把北宋士阶层推上了政治、社会的主体地位,激起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他们因而运用儒学的精神资源,展开了一场大规模而持久的重建秩序的运动。与此同时,佛教的入世转向也与儒学的新发展汇流,更加强了士大夫的使命感。王安石便因为禅